

社会发展状况的主观度量何以可能?*

——欧洲社会景气研究的理论进路与实践进程

魏 钦 恭

提 要 | 实现对经济社会变动状况与运行态势的有效观测与度量,是现代社会的预防系统性风险、化解突出矛盾、实现有序发展的必要手段。缘起于应对经济危机影响后果的现实需要,在反思“GDP主义”以及欧洲社会发展目标从数量向质量转变的理论与实践背景之下,欧洲社会景气研究独辟蹊径,通过建基于民众的主观感受来测量个体发展、社会保护与包容、国家总体图景三个方面的状况,提出表征民众“总和性情绪”的社会景气指数可作为观测一个社会发展状况的“温度计”与“晴雨表”。自2009年以来,欧盟委员会共组织实施了六次社会景气调查研究,为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研判与学术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社会事实资料。同时,该研究的理论观点、测量指标和研究方法亦对推进我国相关研究的发展有重要参考意义。

关键词 | 社会发展 社会景气 欧洲

中图分类号 | C91

作者信息 | 魏钦恭,1985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讲师,100872。

没有颠扑不破的社会理论,亦没有四海皆准的社会观测指标。在社会各子系统关联度日益加深、要素间转换速度不断加快、不确定性或风险性成为常态的现代社会,如何对社会整体发展和运行状况进行观测与度量,防止社会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或化解业已出现的突出问题与矛盾,是无论政策制定者还是实证研究者都需要思考的重要议题。我们以为,欧洲社会景气研究在这方面独辟蹊径,通过建基于民众的主观感受来度量经济社会总体情势,为相应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自下而上、以民众评判为视角的社会事实资料。

“社会景气”概念提出至今不逾10年,可以说是一个新生的学术概念。虽然欧洲已经对其有了多年的研究,但国内相关方面的介绍和研究还很不足。对此,本文的研究问

题是,欧洲社会景气研究的缘起和背景是什么?其理论指向、具体操作指标是什么?现有研究主要有哪些发现?对这些方面的梳理归纳,不仅有利于深入认识这一概念及其研究脉络,同时对推进国内相关方面研究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欧洲社会发展目标的转向及理论背景进行简要梳理;第二部分对社会景气的概念、测量指标与调查方式进行介绍;第三部分从历时变动和横向比较两个方面对欧洲社会景气研究的实证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并描述;最后,进行简短的总结与讨论。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研究”(14ASH013)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市场化进程中的结构紧张与收入不公平感研究”(13CSH024)的阶段性成果。

一、社会景气研究缘起的 现实与理论背景

距 2007 年金融海啸已逾 10 年,仍殷鉴不远。历经 20 余年“大稳定”的全球经济,在此次金融危机打击之下,多数发达经济体同时陷入倒退之中,进入一个趋势性低增长时期和长期停滞状态。^① 经济状况的变化会程度不一地影响到社会发展质量和民众生活福祉,但并非说经济增长水平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正因此,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前后就已经开始反思数量导向的经济运行模式,逐渐将发展目标转向社会发展质量之上。

1. 超越 GDP: 对“GDP 至上主义”的反思

在世界范围内,GDP 是一项被广泛用于测量中短期经济变动状况的有力指针,具有简单清晰和可进行跨时、跨国(区域)比较的特性。^② 毋庸置疑,任何统计指标都有其确切对象和适用范围,一旦被过度使用或倚重都会产生非期然性后果,GDP 作为一项测量经济状况的指标同样如此。2005 年,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提出“是时候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是 GDP,还有民众生活福祉(general well-being)”。^③ 与其说是 GDP 本身导致了社会问题,毋宁认为是决策者过多追求 GDP 数量,使得“唯 GDP 论”的思维和做法将这一指标的角色范围扩展到了非经济系统的整个社会领域,由此导致对诸如环境质量、社会质量、民众福祉等方面的关注不足。

为了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以 GDP 为主要测量指标的发展方式,2007 年 9 月,欧盟委员会组织召开了“超越 GDP 会议”。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哪些指标可以被更好地整合起来用以测量社会发展和政策决策。2009 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GDP 与超越:变迁世界中的测量发展》的研究报告,通过在 GDP 基础上补充环境和社会指标,形成欧洲可持续发展“计分表”,完善和提升经济社会

发展的指标测量,以满足民众关切和适应新技术与政治的发展。^④

无独有偶,2008 年,当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还在进一步发力之时,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亦不满于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统计数据,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阿玛蒂亚森和法国经济学家费图希成立了一个专门致力于测量经济表现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委员会——CMEPSP。目的是对将 GDP 作为经济表现和社会发展主要衡量指标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其他可以有效衡量和判断社会发展状况的补充指标与可行路径。2009 年 9 月,CMEPSP 发布了《关于经济实绩和社会发展测量》的报告,以警醒大众的口吻提到“经济危机带来的教训是,我们引导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就如同飞行员使用不可靠的指南针一样,当度量行为建立在有缺陷的设计之上或者不能被有效理解之时,我们与盲人并无二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更好的度量,以使我们的经济能够有序可循,走出危机。”^⑤

^① 李扬、张晓晶《论新常态》,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66 页。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GDP and Beyond: Measuring Progress In A Changing World,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09DC0433&from=EN>.

^③ A. Stratton & David Cameron, Aims to Make Happiness The New GDP,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0/nov/14/david-cameron-wellbeing-inquiry>.

^④ European Commission, GDP and Beyond: Measuring Progress in A Changing World,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09DC0433&from=EN>.

^⑤ J. Stiglitz, A. Sen & J.-P. Fitoussi,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http://www.communityindicators.net/system/publication_pdfs/9/original/Stiglitz_Sen_Fitoussi_2009.pdf?1323961027.

2. 社会质量研究:对“超越 GDP”模式的再反思

21 世纪以来,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和官方主体开始逐渐反思以 GDP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主要衡量标准的模式,并在理论设计、政策制定等方面付诸实际行动,以进一步完善测量指标,更好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超越 GDP”的发展理路也激发了此方面学术研究的深化。尤其是在重新审视经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有关“社会质量”这一 20 世纪末形成的学术概念被重新带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虽然承认 GDP 增长不能代替社会发展,但对于“超越 GDP”的理论模式和指标设计,社会质量研究者认为仍未摆脱经济中心主义和将社会政策从属于经济政策的窠臼。如认为斯蒂格里茨等人的报告虽然对生活质量有一定的解释并在测量中设计了相应指标,但并未对其内在逻辑关联进行解释;同样,欧盟委员会的报告虽然提及社会质量,但亦未对“社会性”给予清晰的定义。^①

“超越 GDP”模式为何会受到社会质量研究者的诘问,必须回到社会质量概念产生和发展的源流来认识。欧洲社会质量研究的起步是 1997 年众多欧洲学者通过的《欧洲社会质量阿姆斯特丹宣言》。该宣言的目标在于社会科学研究者希求通过让人们关注“社会质量”(social quality)来弥补或替代单纯对经济目标追求的传统做法,进而希望影响欧洲的社会政策制定。那么回到社会质量本身,这一概念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其关于社会发展的度量方式和目标诉求又是什么?

事实上,社会质量并不否认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联,但却反对经济增长必将提升民众生活质量和社会总体质量的单一路径模式。根据范德蒙森和沃克关于社会质量的定义,其指“一个人在一定条件下参与社会的能力”。^②其本体论的基础在于认为个体是“社会性”的存在,而社会性指的是一种空间结构——是在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以及主体与结构的互动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人

们被视为嵌入到特定时空社会结构之中,通过行动以满足自身需求的主体,从而需要重视个人能力的增长并进行社会赋权。^③但恰恰是这些非物质性的需求并非经济增长所能实现。在这一定义之下,社会质量概念被纳入到一个较为复杂的框架之中进行体系化建构。

这一理论框架依据两个范畴生成,一个维度是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另一个维度是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两组关系在结构性相互依赖的原则下交互形成具有四个象限的关系图谱,每一个象限代表社会质量的一个条件性要素,分别是社会经济安全、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同时,四个条件性要素各自有着其规范性取向,即社会正义、社会团结、社会平等和个人尊严。^④我们可以较为直观地看到在社会质量研究的理论视域中,一个社会的发展应该关注哪些方面,而这些方面又是指向哪些目标诉求。除了理论建构,此方面的研究还通过一系列指标的操作化来评估欧洲社会发展质量,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有较大推进。

3. 超越困境与社会质量研究的“困境”

无疑,“超越 GDP”模式对社会层面的关注仍然不足,但社会质量的研究在理论框架和测量指标方面仍过于驳杂,在力图超越以往研究困境的过程中又形成了新的“困境”。一是

^① (荷)劳伦·范德蒙森、艾伦·沃克《社会质量:从理论到指标》,冯希莹、张海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第 206~208 页。

^② W. Beck, et al. (eds.), *Social Quality: A Vision for Europe*, The Hague; Bost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1, pp. 6-7. (荷)劳伦·范德蒙森、艾伦·沃克《社会质量:从理论到指标》,2015 年,第 55 页。

^③ Pamela Abbott & C. Wallace, *Social Quality: A Way to Measure the Quality of Society*, *Social Indicator Research*, Vol. 108, No. 1, 2012, p. 155.

^④ (荷)劳伦·范德蒙森、艾伦·沃克《社会质量:从理论到指标》,2015 年,第 35~55 页。

概念的界定问题。社会质量由“社会”与“质量”两个部分组成,社会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关于“社会性”的论述似乎并未厘清反而容易让人陷入模糊状态之中;质量指代什么,其所对应的社会实际对象也需要进一步澄清。^①二是理论的契合性问题。社会质量的四个维度或条件性要素是否完备且各理想型之间是否相互正交还有待推敲。譬如,社会凝聚与社会包容是否在内涵与外延上完全互斥、自然环境如何被纳入结构条件之中等。三是指标的操作化问题。从现有研究来看,该理论体系的操作化过于繁杂,各项操作指标累积达百项之多,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不仅资料的获取受到很大限制,而且诸如指标的信效精度、权重设计、指数生成等都需要进一步验证和凝练。

事实上,如何在繁简之间取舍、于理论现实之间平衡,是任何一项经验研究都可能遇到的普遍障碍。那么,在关于社会发展状况的度量上是否存在理论取向简明,又在指标操作方面简单(simple)、灵敏(sensitive)和易

行(easy to use)的研究路径?我们以为,欧盟于2009年起开展的社会景气研究对既往过于强调客观指标及冗繁设计的经济社会发展度量方式有很大补益,而无论是“超越GDP”的理论反思还是有关社会质量研究的理论框架,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社会景气研究缘起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背景。

二、建基于总和性情之上的主观度量

2007年经济危机爆发后,欧盟成员国整体陷入经济衰退的漩涡之中。根据统计数据,与2007年相比,2008年欧盟成员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2%;2009年情况更为恶化,同比下降了6.1%,所有成员国无一幸免于负增长,有8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跌幅超过了10%。图1是根据欧洲晴雨表调查(Euro-Barometer)结果和欧盟总体经济增长趋势所绘制的民众生活满意度历时变动状况。^②可以看出,欧洲民众对总体生活的满意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状况紧密相关,当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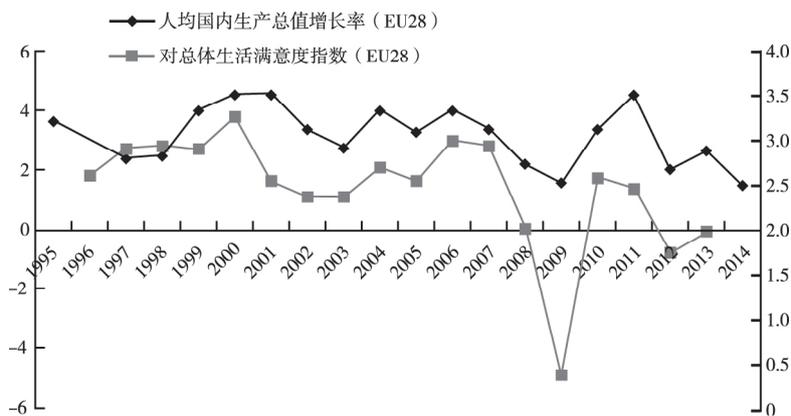


图1 欧洲民众生活满意度与经济增长状况的变动趋势

^① Heiner Ganssmann, Review-Social Quality: A Vision for Europe,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Quality*, Vol. 3, Iss. 1-2, 2001, pp. 144-150.

^② 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自于欧洲统计局网站: <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main/home>; 民众总体满意度数据来自于: European Commission, Special Eurobarometer 418, Social Climate Report (2014), <http://ec.europa.eu/commfrontoffice/publicopinion/index.cfm/Survey/getSurveyDetail/search/social%20climate/surveyKy/2037>.

下滑时民众的满意度亦出现了大幅下跌,这一状况在2007—2009年间表现尤为明显。但是,经济状况的变化不仅在生活条件意义上影响到民众满意度,同时诸如社会平等、社会凝聚、移民、就业等诸多方面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此种情境之下,欧盟急需对社会情势进行准确评估与判断,以利于经济社会政策制定,从而提升社会质量,尽快走出危机阴影,重振民众信心。^①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欧盟委员会开展了关于社会景气状况的调查研究,并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现实考虑。一是客观经济环境变化引致的紧迫感,即如何有效应对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民众生活质量下降和相关衍生性社会问题;二是对既往经济社会观测方式失灵的补救,即如何通过一套可行的指标来准确度量社会总体的发展变动情势,以期获取欧盟各国经济社会运行状况的关键信息,进而弥补单纯依赖客观经济数据的缺陷。

1. 社会景气概念及理论基础

“社会景气”(social climate)是一个类比的学术概念。该概念强调,一个社会的发展状况类同于一个国家的气候或气温变化,即使不同时节、不同地区的气候和气温会有不同,但从长期趋势来看,总体性的变化仍能够反映出整体差异性和变动性。如果说关于气温的变化有科学精密的仪器可以测量,那么社会景气状况凭何进行有效度量?研究者们认为,一个社会的景气状况可以从民众的总和性情绪(aggregated mood)之中反映出来,这种总和性情绪虽由个体态度和感受生成,但一经生成则具有社会事实的特征,会进一步影响民众的态度观念和行为取向。^②

目前,对社会景气仍没有严格的学理性界定,学界亦不存在一套共享的理论框架。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并非一个凭空“飞来”的概念,理论基础深植于欧洲社会理论传统,尤其是关于社会变迁和群体社会心态的研究对其发轫有很大影响。一是,涂尔干以来所形成的社会变迁研究视角,强调社会结构环境

的转型和变动会影响人们的态度感受和价值取向。不难发现,21世纪初的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亦可以看做是一场社会危机,其在欧洲的冲击和蔓延势必对民众的态度感受造成巨大影响。二是,集体心理或群体社会心态的研究在欧洲有着悠久的传统,无论是勒庞对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涂尔干和列维-布留尔关于集体表象或集体意识的探讨,还是莫斯科维奇通过“社会表征”的论述对群体心理学的复兴,都延循着对总体性社会情绪和心态的关注。^③社会景气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是这一理论传统在度量实践方面的深化和体现。三是,与个体态度感受不同,群体性或社会总体性的心态和情绪体验,具有“突生性质”且具有社会事实的特征^④,而这也是社会景气力图通过主观度量反映客观社会变迁的主要理论凭据之一。

具体而言,社会景气研究的理论基础可看做是建立在以下两对范畴之上,即从客观事实向主观感受的转向和从观测个体态度到对社会总体情绪度量的跃迁。一方面,社会景气的研究强调,所有关于客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变化都被内化于个体主观评判之中,其研究预设是,民众感受到的状况(perceived situation)与实际状况(actual situation)之间虽有一定的差距(desired gap),但相较于客观指标,主观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Special Eurobarometer 315, Social Climate Report (2009), <http://ec.europa.eu/commfrontoffice/publicopinion/index.cfm/Survey/getSurveyDetail/search/social%20climate/surveyKy/807>.

^② 张彦、魏钦恭、李汉林《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③ 周晓虹《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4期,第7~8、11~13页。

^④ 关于“突生性”的论述可参见:Ralph H. Turner, *Collective Behavior*, in R. E. Faris (ed.), *Handbook of Modern Sociology*, Chicago: Rand-McNally, 1974, p. 390.

感受更加敏感于外部客观环境的变化,如同“社会温度计”或“社会晴雨表”,可以用来观测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总体社会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而言,个体态度与社会情绪或社会心态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个体属性的体现,而后者是社会属性的表征。一定时期、一定区域中民众所共有的态度观念是社会事实,但这种弥散性的或总体性的社会心态与情绪并非个体态度的简单加总。在个体微观态度与社会总体情绪或心态之间有着多重复杂的转换机制,诸如社会认同、社会互动、情绪感染、集体记忆等都发挥着“转化酶”的作用,同时人们所处客观结构环境的变化亦会产生各种复杂的影响效应。也就是说,作为社会事实的总和性情绪具有宏观性、变动性甚至突发性质。

2. 社会景气状况的度量方式
社会景气状况调查覆盖欧盟所有成员国。

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在每个国家采用样本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方式。问卷调查通过入户面访的形式进行,受访者为15岁及以上人员,调查结果根据相关人口学变量进行加权处理,以反映总体状况。^①调查将社会景气操作化为个体状况(personal circumstances)、社会保护与包容(social protection and inclusion)、国家图景(national picture)三个方面,测量结构如图2所示。调查要求受访者分别对每个方面的状况根据自己生活经历与感受进行主观评判,在现状评判(current situation)的基础上,同时对历史状况比较(compared situation)和未来预期(expected situation)以同样的指标对象进行考察。最后,社会景气指数是在上述指标基础上赋值加总而成,用以反映欧盟和各成员国总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为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以民众感受为视角的社会事实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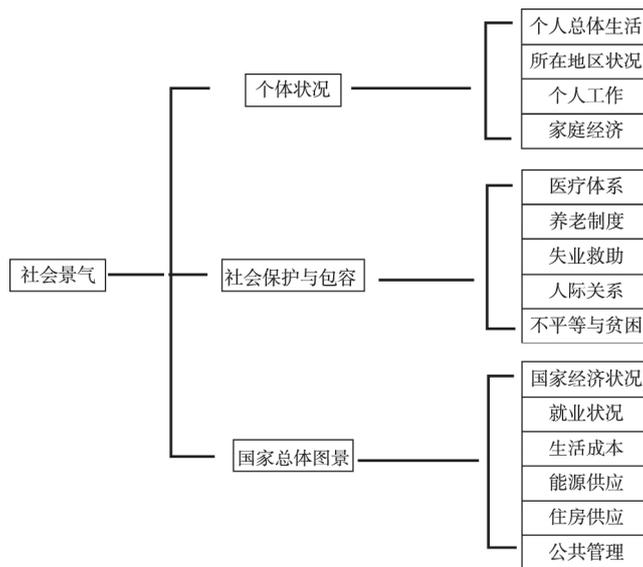


图2 社会景气指数的三级测量指标

^① 调查点在个体单元与区域分层的基础上从每个行政单位(国家)中系统抽取,包括大城市、城镇和农村地区。在每个被抽样点,初始地址被抽取出来后,按照随机程序抽取后续地址。在每个家庭户,被访者按照“最近生日原则”(closest birthday rule)被随机抽取出来,然后在受访者家中进行面访。参见: European Commission, Special Eurobarometer 418, Social Climate Report (2014), <http://ec.europa.eu/commfrontoffice/publicopinion/index.cfm/Survey/getSurveyDetail/search/social%20climate/surveyKy/2037>。

可以发现,与“超越 GDP”主义和社会质量的研究相比,首先,社会景气研究将经济状况视为社会系统或整体发展的组成部分,并强调从民众主观感受层面进行测度;其次,与社会质量研究相比,社会景气的测量在本质上同样关注社会发展的“质”而非“量”,但其理论框架更为简洁,衡量指标更易操作;再次,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超越 GDP”模式,还是社会质量研究,均属于规范性取向,即对经济社会应如何发展(ought to be)的价值预设先于社会实在(what is),并希望以此影响和引导政策制定;而社会景气研究则属于实证取向,即只对社会总体发展的态势进行描述与解释,只为相关社会政策提供事实依据,而不做价值判断。可以认为,社会景气的研究在关注社会发展质量、反对“GDP至上主义”的过程中另辟他途,无论在理论思考还是研究方法方面都具有一定突破和创新。

三、社会景气指数的变动 趋势与比较分析

自2009年以来,欧洲社会景气调查共组织实施了六次,每次调查均保持测量题器一致,并在每个年度发布研究报告。^①下文我们将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对欧洲社会景气状况的总体变动趋势及差异状况进行描述性分析。

1. 总体变动状况描述

从变动趋势来看,欧盟历年总体的社会景气指数分别为-0.7(2009年)、-0.7(2010年)、-0.6(2011年)、-0.8(2012年)、-0.9(2013年)和-1(2014年),下沉趋势明显,年度变化率均值为-6%。横向来看,各成员国之间则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化趋势:就年平均值而言,丹麦的社会景气指数最高,希腊最低;有10个国家的社会景气指数为正,社会景气状况较好的多为西欧和北欧国家。从各国年变化率均值来看,有16个国家为负,其中塞浦路斯的下降趋势最为明显,平均变化率为-54%;马耳他的增长趋势

最为显著,平均变化率为66%。

进一步,我们对民众关于各项目的历史比较、现状评判和未来预期进行交互分析后发现,民众的态度感受具有较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历史境遇、社会现状和未来预期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自感改善有限、对现状满意程度低的事项与对现状满意程度低、未来预期不足的事项在分布结构上基本重合,主要集中于与个体发展和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事项上,如生活成本、住房供应、养老制度、失业救助、能源供应、不平等与贫困、公共管理等方面。也就是说,民众的态度感受具有内在连贯性,历史境遇会影响人们对现状的评判,而社会现状又会影响到人们对未来发展的预期。

^① 此部分数据分析中关于社会景气的相关数据均来自于历年社会景气研究报告。参见: European Commission, Special Eurobarometer315, Social Climate Report (2009), <http://ec.europa.eu/commfrontoffice/publicopinion/index.cfm/Survey/getSurveyDetail/search/social%20climate/surveyKy/807>; European Commission, Special Eurobarometer349, Social Climate Report (2010), <http://ec.europa.eu/commfrontoffice/publicopinion/index.cfm/Survey/getSurveyDetail/search/social%20climate/surveyKy/877>; European Commission, Special Eurobarometer370, Social Climate Report (2011), <http://ec.europa.eu/commfrontoffice/publicopinion/index.cfm/Survey/getSurveyDetail/search/social%20climate/surveyKy/988>; European Commission, Special Eurobarometer391, Social Climate Report (2012), <http://ec.europa.eu/commfrontoffice/publicopinion/index.cfm/Survey/getSurveyDetail/search/social%20climate/surveyKy/1052>; European Commission, Special Eurobarometer408, Social Climate Report (2013), <http://ec.europa.eu/commfrontoffice/publicopinion/index.cfm/Survey/getSurveyDetail/search/social%20climate/surveyKy/1089>; European Commission, Special Eurobarometer 418, Social Climate Report (2014), <http://ec.europa.eu/commfrontoffice/publicopinion/index.cfm/Survey/getSurveyDetail/search/social%20climate/surveyKy/2037>.

2. 经济增长与社会景气

关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一项重要议题。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所做的一项关于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感的研究引发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该研究通过历时比较和跨国比较发现：在一个国家内部，高收入者的幸福感显著高于收入低者；但有意思的是，不同国家在总体层面进行比较后却显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民众在幸福感上并没有显著差异；在进行历时比较后，更有趣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民众总体幸福感的持续提升。^①这一研究结果也被称做“幸福感悖论”或“伊斯特林悖论”。

当然社会景气的涵盖面要远广于单一的幸福指数，但关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效应却

同样是社会景气研究关心的关键问题，即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的经济水平在宏观层面是否对社会景气状况具有影响效应。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参见图3）：无论是在独立年份还是平均意义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愈高，民众感受到的社会发展状况愈加景气，二者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偏相关系数均在0.7以上）。这一结果也意味着，欧洲诸国，尤其是经济发展环境较为恶化的国家（如希腊、罗马尼亚等），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是促进社会景气程度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时，这一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证了社会景气指数具有较高的测量效度。因为如果这一指数与经济发展程度无关或完全偏离，不仅意味着其失去了测量的意义，而且也不符合常理判断，更与社会发展实际相去甚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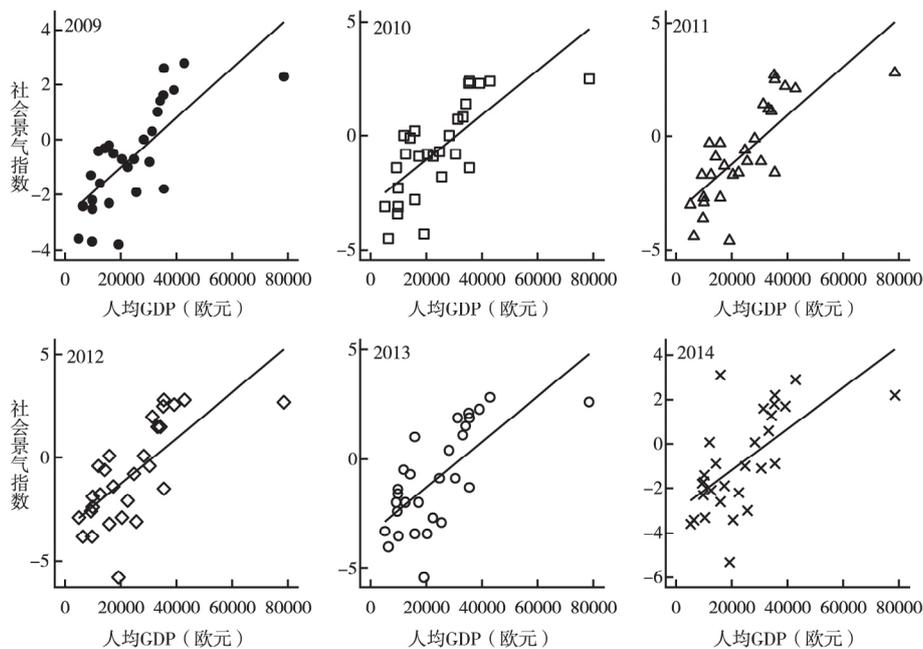


图3 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景气指数^②

^① Richard A. Easterlin,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A. David Paul & W. Reder Melvin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pp. 118 - 121.

^② 各国人均GDP数据来自欧洲统计局网站, <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main/home>。图中散点代表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状况与社会景气程度的交互分布状态。

3. 收入分配与社会景气

在传统的发展观念中,当讨论经济增长问题时,收入分配常被当作是“分蛋糕”问题而被置于核心议题之外。但是研究者们逐渐意识到,收入分配并不仅仅是伴生性问题,当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或日趋恶化时,会使得经济结构失衡甚至扭曲,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活力。^①有研究者在对两次全球经济危机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出现的前兆,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大萧条”前和21世纪“次贷危机”爆发时,以最富有1%家庭收入占总收入比例衡量的收入两极分化都达到了历史高点。^②但我们更应该认识到,收入差距问题不仅影响经济效率和发展动力,其更会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斯蒂格里茨在《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指出,加剧的不平等会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成本,诸如中产阶层的流失、社会流动性的下降、下层民众生活的恶化、失业率的增加等,而当经济问题与收入分配问题相互叠加时,其对社会的影响效应更为剧烈。^③

那么,欧洲的收入分配状况如何?皮凯蒂在《21世纪的资本论》中以直观的数据显示出,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多数欧洲国家的收入分配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这种令人震惊的不平等程度可从工资或财富顶端10%人群占全体民众工资收入和财富总量的比例中直观地显现出来。以法国为例,2010年,工资收入最高的10%人口占到总工资收入的20%,前10%人群的财富占有比重则超过了60%。^④虽然从历史演变趋势来看,这些比例并非最高,但毫无疑问的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当收入和财富分配机制出现资本收益率远

远大于经济增长率时($r > g$),“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马太效应格局就无可避免。

在欧洲近年来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客观事实下,实际收入分配状况对社会景气程度的影响效应也是关键点。通过数据分析(参见图4),我们发现不同国家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差距与社会景气指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收入差距越大,自感社会发展状况越不景气。这一结果可以看做是对上文有关经济增长论的有益补充,即虽然经济发展对社会景气程度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同样应该关注收入分配问题。如果经济发展成果不能惠及大众,而是被收入和财富顶端的部分群体所攫取,那么不仅不能提升社会发展质量,反而会进一步约束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四、小结与讨论

社会景气指数被看做是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温度计”和“晴雨表”,而这种“温度”或“气候”主要指的是民众对相关事项的态度和感受。无疑,客观结构环境的变化会影响社会主体的情绪感受,同样个体的情绪或感受亦会影响其行为取向,进而在总体层面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景气研究舍去了对客观指标的测量,专注于从主观层面度量社会发展情势。这种做法其实是将社会事实区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并认为客观事实的变化能够充分地反映在主观事实中反映出来。这对于我们国内关于社会发展变迁的观测与度量有一定启发意义。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长期将经济增长放置于发展目标的首位,并有专门机构对经济

① Marina Azzimonti, et al.,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Inequality, and the Rising Public Deb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4, No. 8, 2012, pp. 2267 - 2302; Robert J. Gordon, The Turtle's Progress: Secular Stagnation Meets the Headwinds, in Coen Teulings & R. Baldwin (eds.), *Secular Stagnation: Facts, Causes, and Cures*, London: CEPR Press 2014, pp. 47 - 60.

② 刘鹤主编《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第9页。

③ (美)约瑟夫·E. 斯蒂格里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22页。

④ (荷)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76、349页。

景气状况进行实时监测;那么在新时期,为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协调有序发展,开展对社

会发展状况及其景气程度的度量与监测就显得同样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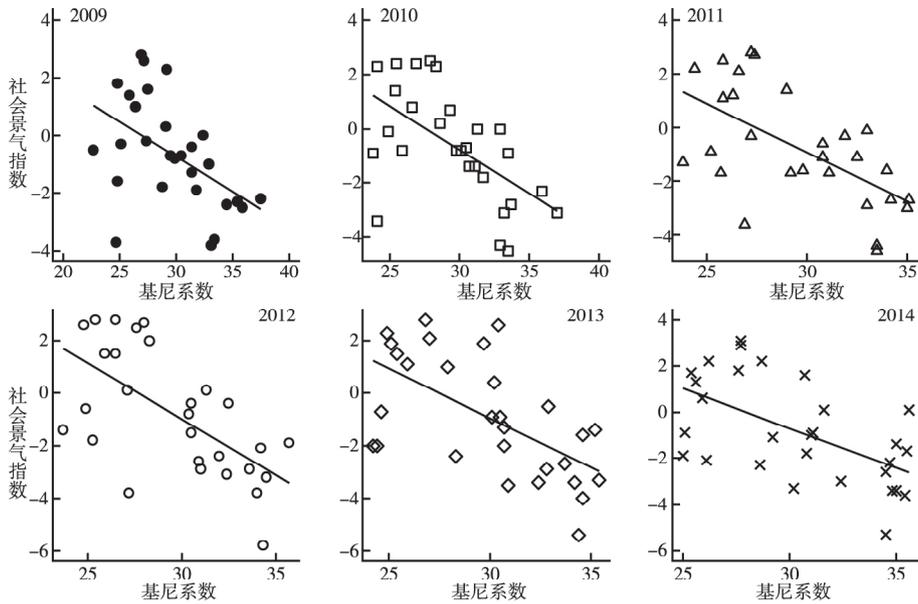


图4 收入差距与社会景气指数^①

当然,欧洲社会景气研究并非臻于完善,而是同样存在需要讨论或改进的地方。

一方面,主观指标是否能够完全替代客观指标?人们的主观态度既受情感驱动,也具有收益权衡之后的理性判断成分。在许多情形之下,人们的态度感受是多种原因的表达和多种心理成分的混杂,并非稳定的常量,且多处于变动之中。当然正是因为变动,对其测量才具有意义,但同样是由于变动,如果对其分析脱离具体社会结构环境,就会使研究结论无据可循。对此我们认为,社会景气的研究应该在理论框架和操作指标之中纳入相应的客观指标和能够反映宏观经济社会结构的要素,通过主客观关联的方式,更为准确地定位民众态度感受的差异变化以及更为全面地解释社会整体的发展变迁。

另一方面,现象描述的同时是否需要内在逻辑解释?从欧盟社会景气研究报告来看,无

论是历时性的比较还是各成员国之间的对比,主要是通过统计数据的描述来呈现变动性与差异性,既对这种变动或差异产生的内在影响机制着墨不多,也没有涉及社会景气状况变化的影响后果,而这些信息对解决相关问题的社会政策制定十分关键。我们认为,相较于场景式的“白描”,加强对民众态度变化的内在逻辑机制解释和因果关系探讨,对更为立体、深入地呈现社会景气状况的变动与影响,具有丝毫不逊于前者的重要意义。

尽管如此,社会景气研究仍不乏理论与实践张力。在理论意义上,其认为民众有关社会具体事项的总和性情绪可作为观测社会变动情势的有力指针;在方法论意义上,将民众的总体社会态度看做是具有结构特征的社会事实,提出以主观方式度量一个社会的变动发展同样可为政策制定提供可信的事实依据。

(责任编辑:张静)

^① 等价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来自于欧洲统计局网站, <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main/home>。图中散点代表欧盟各成员国收入分配状况与社会景气程度的交互分布状态。